

美国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阐释及其限度

伍 斌

内容提要 受全球化、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跨国视野与方法在美国史研究中日受倚重,美国移民史学受其影响尤深。对美国移民史的跨国阐释,推动了该领域以往被忽视的跨国关联的研究,修正了学界诸多陈说。跨国阐释也促进了美国各族裔群体之间历史研究的借鉴与参照,注重不同族裔间的关联与差异,进而抛弃“族裔中心论”,增进了跨族群理解。不过,跨国视野与方法也可能导致对跨国阐释的滥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对移民历史的参与。此外,对移民族群跨国特征的强调,也可能招致移入国民众的恐惧及对移民的排斥。事实上,国家主权与跨国关联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并驾齐驱的共进关系。因此,跨国史研究绝不能忽视民族国家历史的角色,对美国移民史进行跨国阐释也不能完全取代以往基于国家层面的考察。

关键词 美国移民史 跨国史 民族国家 全球化 跨国社会空间

过去三十年间,继“社会转向”(social turn)与“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之后,“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可谓改变美国历史书写方式的又一重要史学思潮。“社会转向”与“文化转向”推动历史学家将研究视野转向社会底层,提倡“自下而上”地审视历史,注重从文化层面考察历史事件。尽管二者修正了以往美国历史研究集中关注政治和社会精英的弊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地,但仍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阐释美国历史,甚至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特定区域。而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则探索以往为国家间关系所忽略的历史,其重点是对“跨国社会场域”(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field)的关注。“社会场域”^①这一概念,是分析移民与母国社会间关系颇为有力的工具,强调互动关联,不同跨国行为体通过各种形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社会思潮更迭与移民史学范式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4ASS003)的阶段性成果。

- ① 美国社会学家佩吉·莱维特(Peggy Levitt)和妮娜·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的研究,提出用“社会场域”方法来研究移民,认为同化和持久的跨国联系并非不相容的二元对立关系。参见Peggy Levitt and Nina Glick Schiller, “Conceptualizing Simultaneity: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3 (Fall 2004), pp. 1003–1004。

的交流,保持跨越国界的社会关系。移民史领域的跨国社会场域,即为移民在来源国和移入国之间的各种网络,其边界跨越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其考察的核心不再是移民政策与同化,而是移民所构建的蜂窝状网络,其中文化关联为其关注的焦点。

关于“跨国史”的内涵及其与“全球史”“国际史”的关系,国内外学界不乏高论。^①饶有意味的是,美国移民史这一受“跨国阐释”影响甚大的领域,却在国内学者关于美国史学“跨国转向”的论述中被忽略了。本文拟在以往学者关于“跨国史”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探讨“跨国阐释”对推动美国移民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及其限度。

一、美国跨国移民史研究的兴起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克拉文(Patricia Clavin)的研究,“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一词于1919年首次出现在关于美国移民和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在随后几十年里,这一词汇虽然偶有出现,但仍鲜为人知。其意涵为“超出国界的利益”,着眼点仍局限于民族国家,与国家追逐利益联系在一起,同国家间关系并无二致。^②20世纪60年代之前,民族国家是历史学不言而喻的重点关注对象。人们通过民族国家表达身份认同,仲裁分歧,行使主权,发动战争等。现代专业化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国家一起成长。记录和解释民族

① 英语学术界对“跨国史”的内涵与内容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4 (October 1991), pp. 1031–1055; Patricia Clavin, “Defining Transnationalism,”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14, no. 4 (November 2005); C. A. Bayly, Sven Beckert, Matthew Connolly, Isabel Hofmeyr, and Wendy Kozoland Patricia Seed, “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1, no. 5 (December 2006); Laura Briggs, Gladys McCormick, and J. T. Way, “Transnationalism: A Category of Analysi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60, no. 3, (September 2008), pp. 625–648; Katherine Pence and Andrew Zimmerman, “Transnationalism,”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 35, no. 3 (October 2012), pp. 495–500;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Isidor Wallimann,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A New Paradigm with Perspectives,” in Carolyn Noble, Helle Strauss, and Brian Littlechild, eds., *Global Social Work: Crossing Borders, Blurring Boundaries*,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4。近年来,国内学界也有不少关于“跨国史”的论述,如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这些论述在总体上对跨国史的兴起,内涵与局限进行了颇具见地的研究,但因着眼点不同而未详述跨国史之于美国移民史研究的意义,对美国移民史领域基于跨国史的视角与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鲜有分析。王心扬对亚裔美国人史学的跨国史进行了简要概括,任慈对近期美国移民史学界基于跨国视野的研究成果亦有简述。参见王心扬《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任慈《可用的过去:近五年来美国学界移民和族裔史研究的新趋势——兼对美国移民研究史的述评》,《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

② Patricia Clavin, “Defining Transnationalism,”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14, no. 4 (Nov., 2005), p. 433.

国家的崛起、变迁和衰落,是民族国家史学的重要使命。^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创时期的美国移民史研究专注于移民来源地和移入地,目光集中在民族国家,侧重移民政策与同化史的研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与关照。^② 如此,研究者就很容易将学术视野局限于特定的民族国家,进而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强调其独特性,甚至生成“例外论”,并依此对其他移民群体进行歧视与排斥。

“跨国史”的兴起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事务和跨国现象的增加,而移民是二者的主导性因素。不仅移民、观念、跨国公司、跨国组织所建立的跨国社会空间直接依赖人员的跨国流动,甚至包括疾病、环境污染、犯罪、恐怖主义等跨国现象都与人的跨国流动存在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国移民是跨国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跨国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兴起,其直接原因是二战后大规模持续的跨国移民活动导致美国同化外来移民乏力及其所遭遇的挑战。

美国的跨国移民并非一种新现象。1800—1914年,大约有6500万人穿越大西洋移民美国,其中不乏在大西洋两岸来回奔波者。^③ 二战结束之初,欧洲移民因文化相似,以及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在经过两三代人之后,基本实现了“融糖模式”的同化,美国的欧洲移民族群及其族裔文化已不再凸显。^④ 然而,这种“融糖模式”同化在二战后不久便遭到质疑。美国社会学家内森·格雷泽和丹尼尔·莫伊尼汉在其1963年出版的《熔炉之外》一书中指出:

① David Thelen, "The Nation and Beyo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3 (December 1999), p. 965.

② 其中的代表成果为: Marcus Lee Hansen, *The Atlantic Migration, 1607 - 1860: A History of the Continuing Settl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③ Walter T. K. Nugent, *Crossings: The Great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 1870 - 1914*,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 具体的移民数据可参见: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pp. 56 - 60。

④ 纵观美国历史,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途径可大致归为三种模式:一是“融冰模式”。在这一同化模式下,移民悄无声息地彻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犹如冰溶于水。二是“融糖模式”。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也对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文化因子部分为美国主流文化所吸纳。三是“扩散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移民虽生活在美国社会,但基本处于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的状态,很难同化入其中,而美国社会则能感知这种冲击,视其为美国社会的“他者”。由于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的边界仍有接触、交叉,虽然彼此并无积极同化的意愿,但被动的同化却在发生作用,犹如物理学的分子扩散一般。这种同化进程尽管缓慢,却一直持续。前两种模式受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Milton M. Gordon)所归纳的同化美国移民“三种同化理论”,及瑞士社会学家亚历杭德罗·卡纳勒斯(Alejandro I. Canales)和荷兰社会学家伊斯雷尔·阿马斯(Israel Montiel Armas)关于移民同化的启发。参见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84 - 159; Alejandro I. Canales and Israel Montiel Armas, "A World without Borders? Mexican Immigration, New Boundarie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 in Antoine Pécoud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eds.,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Essays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Berghahn Books, 2007, p. 235。 “扩散模式”为笔者提出。参见伍斌《当代美国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25页。

“大熔炉并没有发生。”^①这一时期,美国爆发了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民权运动。该运动旨在终结美国社会上针对非裔美国人等少数族群的种族排斥与歧视,保障美国内战后各种法律赋予各少数族群的相关权利付诸实践。这一运动得到了美国诸多少数族群的呼应,女权主义、学生激进主义、反主流文化等运动随之兴起。这些社会运动促成了美国族群意识的觉醒与族群认同的回归,也加强了不同移民族群与来源地之间的跨国联系。

《1965年移民法》彻底取消了1924年移民法对移民来源国的限制,同时放宽了移民限额,标志着美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转折,开启了迄今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与以往欧洲移民占主导的时期相比,当代美国移民构成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主要吸纳来自亚洲及拉美地区的移民。2010年全美人口普查数据直观地呈现出这一族裔版图的重塑:2000至2010年间,美国总人口从2.814亿攀升至3.087亿,增幅9.7%。同期,亚裔美国人(含亚裔血统混血群体)数量从1190万激增至1730万,以46%的增速远超全美平均水平近五倍,成为增长最快的族裔群体。^②拉美裔人口的迅猛增长对美国族裔版图的重塑更为突出。2000—2010年,该群体激增1520万人(增幅43%),占全美总新增人口2730万的56%。其占比从2000年的13%(3530万人)跃升至2010年的16%(5050万人),成为推动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力量。这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白人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并对美国以往的移民同化观念与同化进程构成挑战。^③

移民在移入国的同化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移民规模及持续时间是决定性条件。此外,移民的地域分布和文化差异等特征对同化的影响也颇为关键。首先,移民高度集中于特定区域,如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纽约等州的城市及郊区新兴的“隔都”(ghetto)。这种聚集易形成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削弱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延缓其同化速度。其次,亚洲和拉美移民在种族与文化上与美国主流社会差异显著,这种结构性差异直接影响通婚等深层次同化路径,形成同化进程中的关键障碍。在1994年,亚裔女性移民跨族通婚率随代际递增显著:第一代18.6%、第二代29.2%、第三代41.5%。拉美裔女性通婚率(第一代8.4%、第二代26.4%、第三代33.2%)低于当代美国移民及历史上东南欧移民的通婚水平。男性的异族通婚率则更低。^④拉美裔通婚率较亚裔低,除其同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差异外,

①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The M. I. T. Press, 1963, p. 290.

② Elizabeth M. Hoeffel, Sonya Rastogi, Myoung Ouk Kim, and Hasan Shahid, "The Asian Population: 2010," p. 3,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data/>, 2022年6月10日。

③ Karen R. Humes, Nicholas A. Jones, and Roberto R. Ramirez, "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2010," p. 3,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data/>, 2022年6月10日。

④ 伍斌《当代美国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28—29页;Gregory Rodriguez, *From Newcomers to Americans: Th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American Society*, National Immigration Forum, 1999, p. 22。

也与其在美国所处的阶层普遍较低有关。移民文化差异越明显,与异族通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所处阶层越低,越倾向于隔都聚居,族际通婚的机会也就随之减弱。再次,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增加了非白人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难度。最后,亚裔与拉美裔移民群体中存在大量非法移民,这种身份构成同化进程的突出障碍。移民的非法身份不仅限制其社会经济流动性,还削弱其与主流社会的制度性联系,形成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壁垒,显著延缓族裔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对他们而言,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既无可能,亦无必要。

上述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正在改变美国族裔融合的路径。持续大规模亚裔与拉美移民输入,形成文化张力与移民规模的双重壁垒,迫使移民收缩至族裔聚居区维系传统。族裔聚居区庇护非法移民,而非法移民的存在又加剧社会排斥,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叠加效应导致同化进程放缓,同时推动美国社会文化向多元化发展。族裔群体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通过选择性适应,实现与主流社会的结构性嵌入。这意味着,美国传统的“融冰模式”与“融糖模式”正被“扩散模式”取代,后者在美国移民同化进程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挑战了美国的同质性,也唤起了欧洲裔美国人的族群意识。即便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群体,也在重新确认族群身份,自觉维护并弘扬本族群文化传统,同时积极重建与母国的跨国联系。1966年成立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历史协会(American Ital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标志着意大利裔群体文化自觉的复兴。如果说民权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少数族裔权益保障立法的完善,其更深远的影响则在于激发了各族群的自我认同,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迅猛发展。这种文化觉醒并非简单的历史回溯,而是通过制度性保障与文化自觉的双向互动,形成了当代美国社会文化多元共生的现象。^①这种社会环境较以往更包容族群多样性和跨国联系,也鼓励移民族群维持传统的文化属性,至少不会采取强制措施来同化移民。这表明,移民族裔存在排斥同化的动机,而缺乏同化的动力,与母国的联系因而得以维系并加强。从整体社会观念来看,同化观念也在逐渐走向衰微,而对移民族群跨国联系的尊重与包容,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新方向。

在社会阶层攀升的进程中,移民群体通过主动维系族裔文化边界,将身份认同转化为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策略。其后代通过传承族裔记忆与跨国网络,构建起抵御结构性歧视的文化资本。这种现象催生了超越传统民族国家框架的“跨国共同体”(transnational community),其成员既不完全依附于原籍国,也非单纯融入移居国,而是在全球化流动中重塑身份政治。跨国共同体的凝聚力源于一种“多重归属感”,它既不同于契约性的公民身份,也超越了血缘纽带的原始归属。这种身份实践通过选择性传承与创造性重构,将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资源,从而在国界消解与文化固守之间找到动态平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

^①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2004, p. 171。

上归因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影响的稳定性和持久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已经超越国家边界,如欧洲联盟这类区域组织,促进了跨国意识的增长。

综上所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移民的主体发生变化,由欧洲人转向亚洲和拉美移民。跨国移民研究者因之开拓了视野,从侧重跨大西洋到与跨太平洋并重。移民可以同时参与多个民族国家事务,虽然民族国家仍然极其重要,但社会关系并不全然受民族国家边界的限制。美国移民特征的这种变化,促使学者们愈发质疑传统的同化范式在研究美国移民及其历史时的有效性。主权国家并不是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诚如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所言:“家庭和群体的经济与文化联系直接相关的因素就不是国家。”^①学术界开始探索解释跨国移民的新范式。学者对跨国主题的关注,被视为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反映。“跨国主义”逐渐成为移民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美国社会学界最先注意到新移民的这种变化,并赋予“跨国主义”这一概念以新的内涵。^②跨国流动虽非国际移民史上的新现象,但当代跨国移民已超越传统模式,并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展现出显著特征:其一,跨国移民的规模显著扩大,其流动模式呈现出循环与回迁特征,从而构建起新型的跨国空间。与20世纪中期之前的移民模式不同,早期的欧亚跨洋移民多以单向永久性迁移为主。其二,这种跨国空间的形成,不仅重构了移民的身份认同,还将移民的社会网络、文化资本与政治诉求转化为跨国政治的新议题,从而催生一种超越传统民族国家框架的新型政治实践。

1986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年鉴》(*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指出,“跨国移民和新少数民族的出现”是美国移民研究跨国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③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问世,推动移民研究跨国阐释迅速发展,这些研究从多个层面解释了不同类型移民的跨国关联。^④越来越多研究

① 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5.

② 关于“跨国主义”的内涵与意义,参见 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ism*, Routledge, 2009; 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潮龙起:《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吴前进:《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欧美学者的观点和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③ 转引自 David G. Gutiérrez and 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 “Introduction Nation and Migrat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60, no. 3 (September 2008), p. 504.

④ 相关主要研究可参见: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and Cristina Blanc-Szanton,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Gordon & Breach Publishers, 1994; Peggy Levitt, *The Transnational Villag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Luis Guarnizo, eds.,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eggy Levitt and B. Nadya Jaworsky,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3 (2007), pp. 129–156.

移民的学者,如美国学者琳达·巴斯(Linda Basch)等认为,与早期移民不同,当代移民“建立并维持同时存在的多股社会关系”。^①

基于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其贡献在于揭示了跨国联系的各种层面:从官方制度化联系到民间联系,从群体联系到个体联系,从自觉联系到自发联系等。正是这种差异,促成了跨国视野下移民研究的繁荣。只要存在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其中就有脱胎于移民来源国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因素。移民二代可能更倾向于自我认同为美国人,但由于与第一代的长期接触以及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化归类,使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仍可能继续保持与祖籍国的联系。

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跨国移民保持学术上的敏感,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跨国阐释的反应则相对迟缓。受跨国移民研究成果迭出的影响,移民史学家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方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跨国阐释研究移民史。跨国移民及其相关研究的兴起,给传统美国移民史研究带来了灵感。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促进了族群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文化的寻根。当代跨国移民的兴起以及跨国网络的形成,促使历史学家思考,在此前的移民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跨国移民及其跨国网络。我们可以把跨国移民历史研究定义为研究历史上移民所建立的跨越国界关系与跨国社会网络。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家似乎更愿意用跨国、国际、全球的视角研究移民历史。

学科的内在发展逻辑对推动美国移民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同样重要。受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移民史学家日益对社会和文化着迷,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移民政策与同化史不再垄断移民史研究。事实上,当历史学家更多地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类别、文化认同或个人记忆,而非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美国移民史时,移民历史就被逐渐“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了。^②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族裔群体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情感互动,同时关注移民在移入国及故土间建立的跨国社会场域。那些被用来表达跨国移民历史身份的记忆、故事和艺术创作等文献,即便超出了传统研究的史料范围也不应被忽视。这就需要采取新办法来研究移民史,跨国阐释的引入可谓适逢其会。

①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and Cristina Blanc-Szanton,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p. 48.

② 关于这方面颇具代表的成果包括: Kristin Hoganson, *Fighting for American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c Gallicchio, *Black Internationalism in Asia: The African American Japan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Akira Iriye,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47-62.

二、跨国阐释对美国移民史研究的推进

19 世纪历史学在欧洲的专业化,建立在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并垄断历史研究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美国移民史研究也没有超越这种限制。受二战后美国“一致论史学”(Consensus history)的影响,移民史研究专注于移民在美国的同化问题。其中的代表作便是美国移民史学主要开拓者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的经典著作《拔根者》。该书也提出,从欧洲迁移到美国的移民是失去母国文化的“拔根者”。^①汉德林将移民与母国在文化上割裂的观点遭到后世跨国移民史家的严厉批评。

20 世纪 80 年代后,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贸易网络、国际投资、跨国组织、移民、奴隶制、疾病、环境、恐怖主义等与全球历史发展休戚相关的跨国现象。虽然他们意识到民族国家历史的作用,但其关注点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关系网络。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所构建的跨国联系,无疑是其关注的焦点。被学界普遍认为是“跨国史”的主要发起人和倡导者的入江昭(Akira Iriye),尽管没有专门研究跨国移民史,但他指出,美国移民史领域无疑是“跨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地。在他看来,移民因其变动的国家身份认同,构成了次国家和超国家的存在,是跨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②

事实上,入江昭并非提出从跨国视野来研究美国移民史的第一人,移民史家可能是最早从跨国角度研究历史的一批学者。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移民史家对从民族国家研究移民史这一基于美国中心的研究路径表达了不满,并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美国移民史家鲁道夫·维科利对汉德林的移民“拔根说”提出了批评。他通过研究指出,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并未抛弃其母国的文化传统。^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移民史家约翰·博德纳的《移植者》也强调移民并非抛却过往的“拔根者”,而是与母国存在紧密跨国经济和文化关联的“移植者”。^④博德纳的研究在美国移民史领域掀起不小波澜,并持续产生学术影响,但没有对整个美国史研究形成强大冲击,也未开启跨国阐释历史的潮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美国的移民史研究,尚作为美国史的一个独立研究分支不久,与其他分支之间的联系不如当前这般密切,因而这种变化不为整个美国史研究的学者所注意。另一方面,美国史的主流学术期刊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移民史研究这种变化的长远意义。更重要的是,作者未将其

① Oscar Handlin, *The Uprooted: 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51.

② Akira Iriye, “Transnational History,”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13, no. 2 (May 2004), p. 211;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41–42.

③ Rudolph J. Vecoli, “Contadini in Chicago: A Critique of The Uproote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51, no. 3 (December 1964), pp. 404–417.

④ John Bodnar, *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在研究中所运用的视野与方法归纳为“跨国阐释”或“跨国史”。不过,一些敏锐的移民与社会史学家,已经意识到《移植者》对移民史研究带来的转折性影响。^①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从跨国维度阐释美国移民史的研究激增。这些成果推动美国移民史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综合立体式发展。移民史家至少可以将“跨国移民”追溯到16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持续增长的人口流动与资本主义扩张,促使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相关研究者重新思考“共同体”(community)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跨地区”(translocal)的概念,以便更为具体准确地解释一些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现象,以及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跨区域联系。^②这是跨国主义概念的一次飞跃。美国移民史跨国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突出了人的能动性,重视人的迁移实践及其所构建的跨国社会场域。

在“跨国史”兴起之初,美国移民史领域就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跨国史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美国移民史领域对“跨国阐释”的倚重,在避免以往基于民族国家的移民史研究存在的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见。种族研究、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与移民史研究之间开始紧密结合,不同移民族裔间的历史获得关注。^③继英国历史学家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将非裔美国人历史置于大西洋历史中考察后,^④亚裔美国人历史学家将环太平洋地区作为理解亚洲和太平洋诸岛移民、社区形成和公民身份的区域框架进行研究,其研究兴趣涵盖循环移民、亲属网络和通信技术如何影响国家边界,公民身份的再定义,以及移民群体对“公民”和“故土”复杂且经常冲突的认同。^⑤

近代欧洲由于人口增加和宗教迫害,跨大西洋去往美洲的移民渐增。1815年后,欧洲君主政体得以重建,人们不堪压迫,以及土地缺乏和城市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大规模跨大西洋移民。数千万名移民并非连根拔起,而是构建起一种复杂的跨国网络。英国的弗兰克·西

① Rowland Berthoff, "Review of *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no. 1 (Feb., 1987), p. 220; Thomas Kessner, "Review of *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4 (Mar., 1986), pp. 974-975.

②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Luis Guarnizo, "The Locations of Transnationalism," in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Luis Guarnizo, eds.,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 13.

③ 这方面成果主要有: James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6, no. 3 (Spring 1997), pp. 3-44; Mae Ngai, "The Architecture of Race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1 (June 1999), pp. 67-92; David Gutiérrez, *Walls and Mirrors: Mexican Americans, Mexican immigr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at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⑤ C. A. Bayly, Sven Beckert, Matthew Connelly, Isabel Hofmeyr, Wendy Kozol and Patricia Seed, "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1, no. 5 (December 2006), p. 1445.

斯尔思韦特(Frank Thistlethwaite)、德国的德克·霍尔德(Dirk Hoerder)、加拿大的布鲁诺·拉米雷斯(Bruno Ramirez) 等历史学家都积极地对跨大西洋、跨太平洋或跨美洲移民跨国关联的历史进行再评估。^①

德克·霍尔德试图将移民的传统故事融入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的移民体系。^②事实上,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涵盖全球的移民体系时有出现。资本主义对自由或不自由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普通人对工作和自由的追求,维系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移民体系,以及从拉美向北的移民体系。数百万名欧洲自由移民、非洲黑人奴隶移民,在来源地和移入地的跨地区、跨国流动,有助于建立大西洋移民体系。这种移民体系维持了长期的连续性。太平洋移民系统则存在间断。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西班牙人将数千名被奴役的菲律宾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带到墨西哥和秘鲁。商人、工匠和中国移民,从西班牙属菲律宾、葡萄牙属澳门和中国南方的沿海城镇出发,自由迁徙到美洲。1600年,秘鲁利马的亚洲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5%。后由于移民中断及女性移民的稀缺而无法形成稳定的族裔聚居地。亚洲男性通过与当地妇女联姻,被纳入南美社会,其后裔被归为西班牙裔或美洲印第安人。^③此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亚洲鲜有移民到达美洲大陆。从19世纪中期到80年代,南北美出现自由劳工移民和契约劳工移民。随后太平洋移民因诸排斥法而脚步放缓,直至20世纪40年代相关移民排斥法被废除而逐渐恢复。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可视为第三阶段,大规模的自由移民重新开启,其目的地基本为美国和加拿大。^④在这些移民体系框架内外,只有对不同移民群体在不同目的地的境遇加以比较,才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美国移民经历的意义。这一局限因跨国视野引入移民史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改善。

有关美国黑人移民历史的传统书写,在跨国视野下很大程度地被改写。在北美,黑人并非同质群体。直接从非洲迁入的黑人数量很少,大多从加勒比地区转迁而来。据美国历史

① 参见 Frank Thistlethwaite, "Migration from Europe Oversea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Rudolph J. Vecoli and Suzanne Sinke, eds., *A Century of European Migrations, 1830 - 193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Dirk Hoerder and Leslie Page Moch, eds., *European Migrant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uno Ramirez, *On the Move: French-Canadian and Italian Migrants in the North Atlantic Economy, 1860 - 1914*, McClelland & Stewart, 1991。

② Dirk Hoerder, "From Euro- and Afro-Atlantic to Pacific Migration System: A Comparative Migration Approach to North American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195 - 235.

③ Charles F. Nunn, *Foreign Immigrants in Early Bourbon Mexico, 1700 - 17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 John M. Liu, "A Comparative View of Asian Immigration to the USA," in Robin Cohen, ed.,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53 - 259. Evelyn Hu-DeHart, "Latin America in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in Arif Dirlik, ed., *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 pp. 251 - 282.

④ Dirk Hoerder, "From Euro- and Afro-Atlantic to Pacific Migration System: A Comparative Migration Approach to North American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 200.

学家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 的研究,黑人在早期美国总人口的占比不高,1790年为18%,其中包括1.5%的自由黑人。黑人奴隶的婚姻使其人口自然增加,并保持相对平衡的性别比。部分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通过“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 网络,逃到当时属于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或北部自由州和加拿大。^① 在英国大西洋贸易的背景下,一个早期的自由黑人共同体出现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1774年后,北美殖民地逐渐走向独立,黑人效忠者及白人效忠者的奴隶逃往加拿大。自我解放的美国黑人定居在安大略省和蒙特利尔。在加拿大的白人中出现保护黑人不受美国迫害的言论。^②

多年来,无论是对强制移民还是对自由移民的历史研究,都聚焦于移民对移入地或来源地的影响,而跨国维度的引入促使历史学家进一步研究移民对来源地和移入地施加影响的原因。这方面,同样是研究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学者,开展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美国历史学家罗宾·凯利和沃尔特·约翰逊将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置于大西洋世界中。^③ 对于一些非裔美国人史学家来说,“散居”(diaspora) 既是一个政治术语也是一种分析工具,用来强调因奴隶贸易而分散的非洲人的跨国体验。这些学术研究主要考察散布在世界各处的非洲人后裔在非洲以外的文化、制度和思想的变革,审视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泛非运动的问题。^④ 激进的黑人知识分子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认识到印度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并推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斗争的结合。印度人偶尔也会从散居的非洲人的激进运动中找到反抗压迫的灵感。^⑤ 尽管这些研究将非洲人后裔作为单一民族而忽视了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正是这种从跨区域视角看待黑人过往的研究,迫使这一领域走向跨国化和比较研究。只有在更大的世界背景下才能理解“黑人”世界,反之亦然。

在整个美国移民史学界,亚裔美国人史的研究在运用跨国视野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⑥

① Philip D. Curtin, “The Tropical Atlantic in the Age of Slave Trade,” in Michael Adas, ed., *Islamic and European Expansion: The Forging of a Global Order*,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5 – 197.

② 参见 Robin W. Winks, *The Blacks in Canada: A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Robin D. G. Kelley, “How the West Was One the 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Re-Mapping of U. S.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123 – 147; Walter Johnson, “Time and Revolution in African America: Tempor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Atlantic Slave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148 – 167.

④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h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and Wishart Ltd., 1990, pp. 222 – 237; Kobena Mercer, *Welcome to the Jungle: New Positions in Black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4; E. Frances White, “Africa on My Mind: Gender, Counter Discourse and African-Americ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 2, no. 1 (Spring 1990), pp. 73 – 97.

⑤ Gerald Horne, *Facing the Rising Sun: African Americans, Japan, and the Rise of Afro-Asian Solidar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8; Robin D. G. Kelley, “How the West Was One the 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Re-Mapping of U. S.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136, 137.

⑥ 关于与跨国视野下的亚裔美国史研究,可参见伍斌《跨国视野与美国亚裔史的再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黑人奴隶制被废后,亚洲的“苦力劳工制度”(coolie system),即英国历史学家休·廷克(Hugh Tinker)所称的“第二奴隶制”(second slavery)就已确立。^①19世纪后半叶的“淘金热”为亚洲跨国移民提供了动力。人员和货物在加利福尼亚、加拿大克朗代克(Klondike)、澳大利亚昆士兰、智利、秘鲁等地流动。散居的矿工们及其技术与习俗跨越了国界,其中华人散居尤其突出。包括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内的美国人,将华人的采矿技术人员一并引入澳大利亚。^②

相关跨国史研究显示,北美洲不同文化间存在复杂互动。在环太平洋白人殖民社会中,基于种族焦虑的歧视性土地、移民和公民权法被广泛确立并通过制度化传播。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新西兰针对亚洲移民的排外政策,呈现显著的跨国联动。围绕“黄祸”(yellow peril)恐慌展开的跨国外交虽已有一定研究,^③但系统比较这些移民政策如何塑造不同族群命运的跨国研究仍属新兴领域。特别是当分析跨太平洋移民网络时,被制度性歧视的群体如何创造新的生存策略,尤需跨国视野来展开阐释。

同样,最近关于移民政策的研究不仅关注亚裔美国人群体的经历和被排斥的跨国后果,也涉及美国的法律体系和国家认同。例如,美国华裔史家李漪涟(Erika Lee)的研究表明,1882年《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实施,不仅塑造了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边境政策,还揭示出跨太平洋移民治理的跨国联动机制。^④学界对亚裔美国人与其他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日益增多,推动亚裔美国史从边缘叙事向美国多元历史的深度介入。李漪涟通过跨国与比较研究,将“亚裔美国人”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剖析“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与美洲排亚政策形成跨洲共振。其研究地理范围涵盖美国本土、加拿大、夏威夷、墨西哥及拉美多国,揭示了移民排斥政策如何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边界,形成制度性网络。这类研究通过超越民族国家框架,挖掘移民历史的跨国维度,将亚裔美国人历史置于跨国史研究的最前沿。

跨国视角为理解华人史提供了关键方法。晚清至民国的中国政局动荡与美国种族隔离体系的双重挤压,导致美国华人群体长期处于“悬浮公民”状态。这催生了以血缘、地缘和

① Hugh Tinker, *A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n Labour Overseas, 1830 - 19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② Jay Monaghan, *Chile, Peru, and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of 18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David Goodman, "Gold Fields/Golden Fields: The Language of Agrarianism and the Victorian Gold Rush,"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3, no. 2 (April 1988), pp. 21 - 41.

③ Ian Tyrrell, "Beyond the View from Euro-America: Environment, Settler Socie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181 - 182.

④ 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Enforcing the Borders: Chinese Exclusion along the US Borders with Canada and Mexico, 1882 - 1924,"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9, no. 1 (June 2002), pp. 54 - 86; David Igler, "Commentary: Re-Orienting Asian 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Trans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76, no. 4 (November 2007), p. 612.

职业为纽带的跨国社群结构,成为解读华裔美国人文化基因的密码。突破单一国家叙事框架,系统整合中英文档案资料,追踪太平洋两岸的物质与文化符号流动,是重构美国华人史的有效路径。雷恩华(Andrea Louie)通过粤美侨乡网络的实证研究,剖析资本、人员、信息的循环流动如何塑造“流动的中国特性”。^①艾明如(Mae Ngai)则将淘金华人的跨国实践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时空中,揭示域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②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史研究需警惕“伪跨国”陷阱。徐元音(Madeline Y. Hsu)和陈勇指出,早期华人移民实际上构建了以珠江三角洲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淘金区为核心的“跨地区网络”。这种区域间互动模式既非完全的跨国流动,也非单一国家内的迁移,而是形成了独特的“侨乡移入地”双向共生关系。^③

近期出版的一些关于日裔美国人跨国移民史的成果,颠覆了将同化视为典型美国移民经验的传统思维,在深入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问题和见解,对部分日裔美国人历史的传统观点产生了冲击。比如,在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的问题上,新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跨国主义的影响,但也反映了“历史距离”(historical distance)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被掩饰或被忽略的历史面相渐被人认知。美国在二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这一事件仍然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并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战后,日裔美国人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一直致力于构建和维持一种集体记忆,强调日裔美国人对美国的忠诚,战争中日裔士兵的英勇,以及被拘留者的耐心和隐忍。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相关研究更强调日裔美国人的反抗而非隐忍,以凸显其思想的独立,认为其对美国不忠的指控,不过是种族主义者实施压迫行为的借口。这些趋势也因研究者对档案文献的扭曲和偏颇解读而加强。

跨国史研究者东荣一郎等学者,通过解密档案与口述史资料的交叉分析,重构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日裔的复杂身份实践。在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历史节点上,加州日裔移民展现出独特的“双重民族主义”,他们通过神道教仪式物品“护身符”(imonbukuro),以及战争债券募捐网络和亲日媒体宣传,构建起跨越国境的战争动员体系。东荣一郎指出这些移民在美日两国社会中扮演着“结构性中介”角色,揭示出日本移民群体在战争中跨国身份认同的复杂性。^④相较之下,在纽约的华人手工洗衣协会(Chinese Hand

① Andrea Louie, "Re-Territorializing Transnationalism: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Motherland,"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7, no. 3 (August 2000), p. 645.

② Mae Ngai, *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Gold Rushes and Global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21.

③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 S. and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Yong Chen, *Chinese San Francisco: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 1850 - 194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Eiichiro Azuma, *Between Two Empires: Race, History,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Japanese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7.

Laundry Association) 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帝国主义行为。他们的口号是“拯救中国 就是拯救自己”(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在美国的华人认识到他们支持或反对日本帝国的立场,对其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影响巨大。同时,美国的支持也对母国的成功至关重要。^①

以往美国亚裔历史学家对中日战争的研究,集中在单个移民群体的经历上,忽略了“帝国”因素及其多民族跨国背景与联系。新近的跨国研究表明,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都已成为影响西太平洋的强大帝国,两国间的关系对中国及亚洲移民的生活影响甚大。这些都超出了本地、本国家的语境,必须在帝国与跨帝国语境中进行考察。美国移民史家奥古斯都·埃斯皮里图认为,帝国间关系应成为亚裔美国人历史书写的最重要部分。^② 移民与帝国研究表明,二战期间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同美国其他移民族群的历史有相似的跨国特征。

多萝西·罗尼融合了帝国史与跨国史两种研究路径,提出了颇有启发的观点,即将太平洋纳入美国历史书写。她指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太平洋既是域外又是国内。在特定时期,关岛、菲律宾和夏威夷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地。同时,移民链往往由帝国建立的军事或贸易关系发起。^③ 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主席演说中指出,亚裔美国人史和殖民史通过从“太平洋世界的视角”来写作,促进了美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④

与亚裔美国人的跨国社会空间类似,研究边境地带(borderlands)的学者也认为,移民网络不断变动,在两种文化间交换人员和信息。例如,墨西哥移民越过边境,找到工作,然后回到墨西哥结婚。在这种跨越边境的圈子里,相关信息得以传播共享。^⑤ 与研究跨大西洋的学者相比,研究美国西部的学者认为,西部历史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随着环太平洋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来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新移民,逐渐改变着美国历史的书写,西部历史的地位日渐凸显。^⑥ 而且,随着美国以外地区国家档案的发掘和运用及其学

① 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0 - 101; Eun Sik Yang, “Korean Women of America: From Subordination to Partnership, 1903 - 1930,” *Amerasia Journal*, vol. 11, no. 2 (Summer 1984), pp. 21 - 22.

② Augusto Espiritu, “Inter-Imperial Relations, the Pacific, and Asian American 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83, no. 2 (May 2014), pp. 239, 253.

③ Dorothy Fujita-Rony, *American Workers, Colonial Power: Philippine Seattle and the Trans-Pacific West*,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Eric Foner, “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 no. 1 (February 2001), p. 16.

⑤ David Thelen, “Of Audiences, Borderlands, and Comparisons: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9, no. 2 (September 1992), p. 440.

⑥ Katherine Benton-Cohen, *Borderline Americans: Racial Division and Labor War in the Arizona Borderlan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achel St. John, *Line in the Sand: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U. S. -Mexico B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术活动的丰富,美国西部史的研究必然会步入发展的新阶段。

传统的美国移民史研究具有族裔中心主义的色彩,强调本族裔的特性。跨国移民史的研究促进了美国不同族裔间的理解。仅从单一移民群体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其解释力具有局限性。导致移民从事跨国活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移民群体所遵循的跨国共同体建设的特定路径受其移入地的环境和融入模式的影响。只有对跨国活动的决定因素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认识其中的差异。^①在艾明如看来,从跨国的视角研究移民史,“可能会使我们从一种强调霸权话语的接触方式,转变为一种寻求理解、接触、转化、交流、谈判、冲突,以及其他动力所构建的跨文化和跨国界社会关系”。^②

三、美国移民史研究中跨国阐释的限度

“跨国”书史,无论在内容上或是方法上,皆为美国移民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重书了诸多旧有的叙事,深化了对整体历史的认知。以跨国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历史,已为美国移民史学界,乃至整个美国史研究界所普遍接受。然而,跨国史有其限度,^③不宜将之用于所有美国移民族群历史的研究中。研究早期美国移民史尤其需要注意这点。研究者需要思考,定居者、旅居者,或是跨国者,是否存在跨国社会空间及建立这种空间所需的条件。研究表明,为数不多的移民经常从事经济和政治跨国活动,更多移民只偶尔为之。^④跨国历史尽管有其优势,似乎提供了一种手段来避免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弊病,但在美国,民族主义一直强烈。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史研究者并不否认美国价值和社会实践对各移民共同体的影响,也不否认国家权威在移民问题上的作用。相反,这些影响和作用显示了跨国生活的复杂性,包括多重民族主义彼此拉扯的张力。

移民不仅可能对各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带来变化,还可能影响各国的内部职能,迫使移入国制定保守的法律来保护传统价值观。移民一旦出国,往往会与家乡故土保持联系。然而,移入国的国民对这种移民并没有脱离其旧世界的现象感到不安,甚至产生恐

① José Itzigsohn and Silvia Giorguli Saucedo,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and Sociocultural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6, no. 3 (Autumn 2002), p. 767.

② Mae M. Ngai,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her’: Response to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7, no. 1 (March 2005), p. 60.

③ 对跨国史的批评与反思,可参见 Nancy L. Green, *The Limits of Trans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刘祥《近年来史学界对跨国史的批评与反思》,《全球史评论》2021年第1期。

④ Peggy Levitt and Nina Glick Schiller, “Conceptualizing Simultaneity: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3 (Fall, 2004), p. 1005.

惧。^① 考虑到移民的双重忠诚可能会在他们的移入国产生“过敏”反应,一些学者试图缓和这种不安,指出移民对母国的忠诚很少会持续到第二代,应该接受移民二代的跨国活动,因为这“实际上可以促进成功的适应”。^② 但相关学者并没有给出任何协调跨国移民与接收国公民间关系的积极建议。对移民的跨国主义研究,还可能会给移民造成问题甚至危害。在一个排斥移民的国家中,通常将具有跨国关联的居民视为威胁,当有关民族国家发生冲突时,问题可能更加激化。

一些研究人员认识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各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移民与故国保持联系会成为趋势。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移民仍然遵循着前人渐进同化的传统模式,与故土的联系逐渐减少。不同移民群体的跨国模式各异。经常返回母国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毕竟,历史上回母国的旅程对很多移民来说其代价过于昂贵,即便对当代移民而言亦是如此,尤其是从北美到亚洲的旅程开支。移民更有可能保持间接的跨国接触,比如阅读故土母语报纸,以及维持与在母国亲人的信件往来。在通讯发达的今天,则可通过网络实现更紧密的跨国接触。埃里克·方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跨国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久,移入国的同化影响无处不在。在新国家停留的时间越长,运用各种通信手段维持跨国接触的强度和广度就越弱。随着亲戚因跨国移民链而一同移民后,跨国接触也随之弱化。该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表明,语言能力和教育水平与跨国接触的强弱关系不大。^③ 这呼应了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阿尔巴和维克托·尼的论断,即当代美国移民遇到的结构性同化障碍减少了。^④ 承认部分移民在进入移入国后,仍与其母国保持着牢固和持久的跨国联系,与传统基于民族国家的移民政策与同化史研究并不冲突。

这种“跨国移民”的历史对整个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也需进一步探讨。部分学者质疑历史上移民跨国行为的普遍存在,或有持续深远的影响力。移民的跨国行为并不新鲜,历史上移民的跨国联系一直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跨国行为会逐渐减少,对其后代的影响有限。基于个案的跨国移民史研究,经常夸大甚至歪曲所研究移民族群的跨国历史。^⑤ 对跨国移民史的上述质疑各有其道理,这就需要跨国移民史家予以回应。但回应这些质疑

① Roger Waldinger and David Fitzgerald, “Transnationalism in Ques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9, no. 5 (March 2004), p. 1192.

② Alejandro Portes, “Conclusion: Towards a New World—the Origins and Effect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 (Summer 1999), p. 472.

③ Eric Fong, Xingshan Cao and Elic Chan,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Patterns of Transnational Contact Among Chinese and Indian Immigrants in Toronto,”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5, no. 3 (September 2010), p. 445.

④ Richar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⑤ Peggy Levitt, Josh DeWind and Steven Vertovec,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7, no. 3 (Fall 2003), p. 565.

殊非易事,因为如若深究,“跨国主义”的含义本身仍模糊不清。

另外,学者们也不能忽视21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全面的移民权利运动,其诉求给思考国家、移民和公民身份带来了新的挑战。饶有意味的是,移民权利运动的目的是争取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合法化和获得公民权。当然,获得公民身份的意义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寻求美国公民身份的移民,未必是认可美国的价值观与制度,而是为了免于被驱逐出境和追求经济机会。^①这些诉求都局限在美国主权民族国家之内。对多数移民而言,跨国联系更多的是手段,融入美国社会、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才是目的。

跨国史研究本身也存在难以逾越的困境。跨国移民涉及多维度社会场域的复杂互动,唯有将其置于多层次分析框架下,方能完整解读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与生存图景。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将移民置于次国家、国家与超国家的三维关系中加以考察。若忽视这三个维度的交叉作用,任何关于移民史的研究都可能陷入片面化的困境。当研究视域突破单一民族国家框架,研究者需要在时空上追溯跨地域人口流动的轨迹,并解析多重因素的交织。这种立体化研究范式不仅要求掌握多国档案与多语种文献,更需要具备在庞杂的史料碎片中辨识因果链条的洞察力。即便能够完成跨国史实的客观描述,如何准确界定全球化进程中的因果关系网络,如何平衡结构性制约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对研究者学术能力的极大考验。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对“跨国史”的特质进行了归纳:“其一是国际视野;其二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其三是侧重小人物、文化层次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要求对中外历史都要有很深造诣;其五,能够熟练掌握外语。”^②面对跨国史如此复杂艰巨的研究挑战,大多研究者穷一己之力也未必能入其门径。跨国学术合作或许就成了一个可行的选择。合作不仅可以涉及不同的主题和语言,还可涉足不同民族历史的实践及问题。

跨国史除了其特有的研究难度外,也可能存在武断地阐释历史的问题,研究者甚至改变历史原貌,以适应跨国的框架。历史记录因要为“跨国史”服务而被扭曲甚至篡改。跨国历史研究的使命或许很重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历史全貌。在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伊恩·泰勒(Ian Tyrrell)看来,“新跨国史”代价太高,而这种代价是可以避免的。^③

跨国史若对主权国家忽视乃至无视,即便不是本末倒置,至少也是以偏概全。跨国史研究者需重视民族国家对跨国社会空间所施加的影响。现实情况往往是,跨国关联对民族国家的影响通常有限,而民族国家能对这种跨国关联施加决定性影响。尽管去国家化在促使

① 参见 Irene Bloemraad, *Becoming a Citizen: Incorporat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② 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第23页。

③ 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4 (October 1991), pp. 1046, 1047.

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研究过去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也生出另一种倾向,即以牺牲大局为代价来赞美地方和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历史学科正变得狭隘、过时和无关紧要。因此,研究者需以某种方式把国家和地方结合起来,发展一种新的综合。另外,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或“非国家行为体”或者跨国公司、移民所建立起来的跨国社会空间,是否真能超越民族国家,也大可存疑。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相关国家工作、居住,受该国法律与政策的约束。在冲突的特殊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受到所在国的限制,甚至被驱逐。^①

尽管跨国书史已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一大潮流,入江昭甚至认为跨国书史是研究历史的最好方法。^②这一论断极有可能导致“跨国主义”观念的排他性。但是,他的跨国书史有两种值得再探讨的前提预设:一是国家政府权力走向弱化;二是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渐衰微。^③即便在跨国联系日益密切的当代世界,国家政府权力和民族国家主权也未必遭到削弱。跨国关联并非与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毫不相干;相反,很多新生的跨国关联是由民族国家主导,或者是民族国家发生影响的关联,无论是欧共体还是亚投行,概莫能外。这些组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政府的职能。与此同时,传统的政府职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进一步延展。而跨国关联则具有相对脆弱性,在当前和平的世界环境之下,表现出相当活跃的跨国关联,一旦国际局势趋紧,诸多跨国联系将因国家安全考量与政府权力的集聚而断裂。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与政府权威的挑战,所引起的政府权威不稳定,必然会导致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和政府权威的反弹。当今国际体系权力呈现出碎片化,反映的恰是国家主权的扩展。可见,主权民族国家大政府的生命力依然活跃而不可替代。

认为“跨国关联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观点,可能是一种基于想象的“迷思”(myth)。“国家主权原则是不可超越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鉴于国际社会根本无法找到取代国家主权的其他基本准则,一旦否定了国家主权,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国内和国际秩序混乱。^④且不说面对这种丰富的跨国网络,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国家主权理念来阐释,即便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诸多跨国网络,也仍然可以在传统的国家主权理念之下得到有效解释。国家主权与跨国关联并非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并驾齐驱的共进关系。

毋庸置疑,当前世界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民族国家间联系愈加紧密,跨国群体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关切与认同的共同体意识也在持续发育,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历史学家应当予以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歧视、排斥、敌对,乃至战

① Isidor Wallimann,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A New Paradigm with Perspectives,” in Carolyn Noble, Helle Strauss, and Brian Littlechild, eds., *Global Social Work: Crossing Borders, Blurring Boundaries*, p. 24.

② 入江昭著,王勇萍译《我们生活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入江昭的这一看法后有所修正,逐渐承认民族国家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参见入江昭著,邢承吉、滕凯伟译《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4页。

③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19–22, 51.

④ 黄仁伟、刘杰《国家主权新论》,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重点参见第一章,引文引自第37页。

争都是接触的结果。它们都是跨国关联的产物,却也走上了“人类共同体”的背反道路。无论是歧视与排斥,抑或是敌对与战争,越到全球化以来的晚近时期,就越表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也开始对政治和外交现象感兴趣,并设法将国家和国际历史写成社会或文化现象。^①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未偏离史学的中心。

阐述跨国书史的限度,无意说明“跨国”书史不重要,恰恰相反,“跨国”视野是全球化语境下不可替代的书史方法。它能够打开研究者的视野,同时对人类历史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理解,史学研究可以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然而,至少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仍然是历史书写的主角,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仍然是解释历史的核心内容。“跨国”更多的是主权国家主导下的“跨国”。因此,对任何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跨国研究,恐怕主权国家仍然是无法绕过的参照因素。对美国历史上的移民进行跨国阐释,也不能完全取代以往基于国家层面的考察。诚如李漪涟所言:“民族和民族国家仍然是解释移民进程以及移民本身生活的中心因素。”^②

结 语

美国移民史的跨国阐释,无疑有助于拓展移民史研究者的视野。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本身就是移民跨国流动的产物,早期移民塑造了美国的特性,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形式等。正如美国史家卡伦·科珀曼所言,在16、17世纪,“美国成为国家前就是国际化的”。^③ 19世纪末,美国逐渐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由国际事务的消极接受者逐渐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跨国视角的运用,有利于我们深化对移民、帝国与殖民间关系的认知;有助于绘制跨国共同体的历史,揭示其在时间和空间上隐藏的联系与差异。此外,移民族群共同体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也因跨国界的联系而改变。因此,从跨国角度研究美国移民史,其意义不言而喻。

通过对美国移民史进行跨国阐释,也对我们研究其他地区的移民史提供类似的启发。移民作为重要的跨区域现象,早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从早期的犹太人离散,到近代的大规模全球性移民。这种跨国关联已日益引起移民史学家的注意。在大规模欧洲移民进入北美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去往东南亚,印度也有数量可观的移民前往非洲和东南亚。而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很多再次移民,从东南亚和非洲移民到相对发达的欧洲、北

① 参见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 - 196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② 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 - 1943*, p. 9.

③ Karen Ordahl Kupperman, "International at the creation: early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 105.

美及大洋洲。跨国移民的身份也千差万别,包括劳工移民、“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s)、“战争新娘”(war brides)、难民、教育移民、投资移民等。其中,劳工移民还包括自由劳工移民和强制劳工移民。二次移民所建立的跨国网络尤其复杂,基于任何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阐释,都无法解释他们所建立的跨国社会场域,及彼此纠葛的多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跨国视角的运用无疑将成为基于民族国家的传统移民史学的有益补充。

然而,跨国史研究绝不能忽视民族国家历史的角色。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形式的跨国社会空间都很难将这种影响排除在外,在研究中不考虑这种影响是有失偏颇的。诚如王立新教授所言“跨国史是对国家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优秀的历史写作是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和跨国史视角之间保持分析和叙述的平衡。”^①同样,在对美国移民历史进行跨国阐释的过程中,考虑民族国家的参与,或许更能反应事件的全貌,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

[本文作者伍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杜娟)

^① 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第160页。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he question of ‘who owns the American history’ yields new answers and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American history that is characterised by multiple ‘binary oppositions’ is gaining popularity. Many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are devoted to self-examination pertaining to oppressions , discriminations , and injustices which were committed by themselves in the past , and provide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for various contemporary social inequities. Meanwhile , the American historians are compelled to take sides. Undoubtedly , the history of identity groups has its academic valu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 but its long-term impact on the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nd social politics remains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identity turn’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offers various insights for obser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 and illuminates with valuable references to contemplate ‘what kind of the American history is needed today’.

Wu Bin , Transnational Interpretations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have gained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y particularly influenc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Influenced by the globalisation ,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 the multiculturalism , the surge in the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migrant networks and activities , and the accelerated awakening of ethnic self-awareness among immigrant groups , ‘transnationalism’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paradigm in the American academia. The transna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 promoted the study of cross-border connections which was previously overlooked , challenging and revising the entrenched scholarly narratives. Those approaches also fostered mutual learning and cross-reference among historical studies of diverse ethnic groups , emphasising intergroup linkages and distinctions while rejecting ‘ethnocentrism’ to promote interethnic understanding. However , transnational frameworks may also lead to the abuse of transnational interpretations ,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 the potential neglect of the role of nation-states in shaping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In addition , excessive emphasis on trans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may inadvertently incur fears of receiving countries’ people and their rejection of immigrants. In fact ,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were not a zero-sum game , but a co-progressive relationship. Therefore ,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iography must not marginalise the role of nation-state historie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 cannot completely replace the previous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level either.

Bi Jiankang , Colonialism and Modernisation: The Re-Examination on the 1919 Revolution of Egypt

In the process of resisting the French invasion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 the Egyptian nationalism emerge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gyptian modernisation was tortuous. In December 1914 ,